



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

核心阅读

万里是一位改革闯将。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是立了功的。万里的农村改革思想和实践经验，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 侯 悦

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和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安徽省农业管理体制的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后，他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他提出改革农业管理制度，发展商品生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

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1970年代，安徽是农业大省，又是贫困省，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万里到任安徽省委书记后，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深入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淮北的阜阳，皖东的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区，开展调查研究。万里调研的一大特点是：不打招呼、不带随行人员，随时随地同群众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为的是看到真实情况，听到群众的心里话。定远县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只求吃饱饭的简单要求，张家农户一根木棒就能搬走全部家当的贫穷境遇，凤阳农民为讨饭扒车外流的情景，深深刺激了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万里意识到农村工作的核心问题是：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搞好农业生产，迅

速提高全省农民生活水平。

首先，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万里带领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安徽省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六条》释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信号。其中，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内容，突破了当时批判“自由种植”和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禁区。万里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敢于担当，勇敢地越过了雷池一步。而这一步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万里看到滁县地委关于“包产到组”的调查后，作出题为《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的讲话，对《六条》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修改和完善，提出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凤阳县大包干、小岗村包干到户等多种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实践。

其次，解放领导干部的思想。安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领导干部是政策的执行者。究竟是执行当时“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中央文件，还是尊重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实践？一些干部心存疑虑，怕犯错误。对此，万里认为领导干部应该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左”的束缚，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能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二是领导干部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对于不适合本地情况的中央政策，要讲明情况、原因，提出意见，报告上级党组织。对于安徽出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万里及时向中央报告，提出意见，并获得了邓小平、叶剑英的同意。由此，安徽省的领导干部普遍解放思想，积极落实安徽农村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

通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转变领导干部思想，万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实现了安徽农业增产增收。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要吃米，找万里”便是人民群众对他这一时期农村改革工作的肯定和赞扬。

冲破阻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2月，万里到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阻力来自于部分领导干部的认识。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农业集体经济、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明里暗里抵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的推广。1981年3月，万里在农业部党组会上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万里提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号召农业部的干部虚心、真诚地向农民学习，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左”的思想，不搞“一刀切”。在万里的建议下，1980年4月国家农委组织农口各部门领导100多人，深入农村、农民当中进行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走家串巷、田头谈心等各种形式，这些领导干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了解了农村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从1982年到1986年，万里连续主持制定了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构成了一幅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蓝图。五个一号文件连同其间万里五次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指导中国农村改革深入发展。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上了姓“社”的户口，为几年来的争论作了总结。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将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万里在1982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回顾了三年来自从不联产到联产，从包工包产再到包干的变化历程，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决不能低估。它适合中国的国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中国农业以7%的土地养活了约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致力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出现了农民利用剩余劳动力、剩余资金，发展多种经营的商品性生产的新局面。万里认为，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是农村经济新局面的一个基本特征，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改变不相适应的农业管理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开阔眼界，抓住机遇，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

发展商品生产，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万里主张从两个方面入手发展商品生产：一方面，要遵循商品的价值规律。一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符合社会需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和品种规格上都要符合国内以至国外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变革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管理制度。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取消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双轨制”。但万里对于粮食购销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并没有止步，1986年12月，万里指出：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产品持续增产，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但一些地方出现了“卖粮难”“储粮难”“运粮难”的情况。这对领导干部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服务农村经济提出了新要求。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推荐了河北廊坊市委的调查报告和无极县调整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两份调查报告，为农村干部提升领导水平，促进经济、促进改革提供了示范。万里要求领导干部需要有现代化的眼光、全面的经济知识和总揽经济全局的能力，不能只当农业书记、粮食县长。领导干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价值规律，抓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关键环节，重视先进科技和装备在现代化农业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农村教育和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各个部门都要积极地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服好务，保护和进一步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党史人物

信念坚定，宁死不屈

1928年3月9日下午，傅烈与参加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的8名共产党人一起被捕。傅烈被捕后，最先想到的就是党组织和同志们安全，要大家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敌人希望按图索骥，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当天晚上重庆警备司令王隆基亲自审问，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想要的片言只字！”在狱中，虽然备受折磨，但傅烈心中最惦记的还是党组织。他两次不顾个人安危将需要转移的材料和后续的安排等重要信息通过地下党员传递出去。生死临别之际，他写下两封家书。一封告诉父亲：“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一封告诉妻子：“你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并在信中赋诗：“拼将五尺头颅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这些话语字字泣血，无不表现了傅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仰。1928年4月3日，傅烈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从容就义，年仅29岁。

史海拾贝

编者按

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强调要把抓好党支部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作为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新时代党支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深入学习贯彻《条例》精神，本报将刊发改革开放以来党支部建设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以及新时代加强党支部建设举措系列文章。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始终把党支部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建党以来，党支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充满了曲折、艰辛和探索、创造，为改革开放后加强和改进党支部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和理论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支部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调整加强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前，我们党坚决清除“文革”错误影响，恢复完善党支部基本规范，调整加强党支部制度建设。

党的十二大党章在党的八大党章的基础上，凸显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基层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1986年2月，为适应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变化，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在乡建立乡党委，在村建立党支部，农村党支部组织形式也由原来按照生产大队设置改为按行政村设置。同年9月，党中央对企业党支部的功能定位、职责任务和工作方法等作出全面规范，有力推动了企业改革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开始探索如何在“三资”企业中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党的活动。这一时期，建立了深圳特区第一家合营企业党组织——竹园宾馆党组织，其成功经验获得党中央高度肯定。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了企事业单位党支部的职能定位，规定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按乡、镇、村三级来设置。1988年，党中央印发《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规范了支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

二是全面发展阶段。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八大前，我们党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建立和完善党支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党支部建设。

1989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建设这一重大任务，强调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核心作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党章明确“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以党支部为重点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战略思想基本形成》。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外企”基层党建工工作迎来新发展。全国近3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中，有31%建立党委、党总支和支部。与此同时，党中央加大在社会组织、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以及街道、社区中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力度，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的，都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极大地促进了这些领域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这一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党的十七大强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赋予包括党支部在内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新的内涵。

三是深化提升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

党支部建设的发展历史

□ 樊得智 张法娟

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基层党组织要严格履行监督职责”。2013年以来，在全党先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中央要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及“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党的十九大党章赋予党组“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的职责，这是加强机关党建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强调“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2018年7月，中央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要“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开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新局面”。同时，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要求“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还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关键是从严抓好落实”。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党支部建设质量不断提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201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党支部建设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建视角

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的傅烈

□ 朱一华 何兵兵

1928年3月10日凌晨，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趁看守警察睡着的间隙，轻声但坚定地对一起被捕的同志说，“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24天后的4月3日，年仅29岁的傅烈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党绝对忠诚、舍生取义的诺言，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不变初心和高尚品格。

注重宣传，以身作则

傅烈，1899年出生于江西临川，1920年赴法国学习并参加革命活动。从1925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到1926年参加北伐，再到1927年重建四川党组织，傅烈都尽职尽责呕心沥血，尤其在开展宣传工作方面煞费苦心，亲力亲为。傅烈认为“宣传工作和军事一样重要”。他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倡导并践行做好宣传工作的“三对法”，即“对内，应有持续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应有规模化专业化的宣传队伍；对不坚定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也靠宣传工作去改造他们。”所以，不管在哪里，傅烈都能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助推革命的发展。

1925年10月，第三军奉命平定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的叛乱，傅烈

带领政工人员率先南下。每到一处，他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军队的严明纪律。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获得了沿途群众的极力支持，保证了讨伐最终取得胜利。1926年7月，傅烈在北伐途中不遗余力地向官兵和工农群众宣传革命宗旨和行军纪律，鼓舞了革命士气，壮大了革命声势。第三军进攻南昌时遭遇不利，只能作战略上的暂时退让。个别军官四散逃命，一时间队伍乱作一团。危急时刻，傅烈挺身而出，统一大家思想，引导部队有序撤退。1927年，傅烈奔赴四川后，面对复杂的革命局面，先后领导创办了《川潮》《四川通讯》《学生时报》等刊物，积极有效地宣扬了革命道理、激发了革命热情、鼓舞了革命斗志，为四川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坚强保障。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残酷镇压重庆社会各界人士爱国集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3·31”惨案。随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被捕杀害，四川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革命斗争陷入低潮。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决定傅烈任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委以“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开新局面”的重任。

傅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责任临危受命，迅速抵川后，冒着生命危险在艰巨复杂的形势中开展工作。8月，傅烈在重庆建立四川临时省委，凝聚起当地最坚强的革命力量。9月，主持召开临时省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四川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他强调：“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10月，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傅烈对过去党内思想和组织上出现的散漫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并作出严明的纪律规定，以“特别通信第一号”的形式通告四川各地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这次会议，有效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为巩固和发展全川党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傅烈领导下的四川党组织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1927年12月底，党员发展到600多人，成立了2个市委、8个县委和10个特支。1928年2月，临时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提出“于最近二三月春荒期內加紧各种斗争，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的武装暴动如雨后天春笋般爆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巴蜀革命浪潮。傅烈以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干劲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